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对外贸易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对外贸易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5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ISBN 978 - 7 - 5095 - 1490 - 0

I. ①1… II. ①中…②中… III. ①经济 - 档案资料 - 中国 - 1958—1965 IV. ①F129.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9214 号

责任编辑: 樊 闽

责任校对: 杨瑞琦

封面设计: 陈 瑶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43.5 印张 1 114 000 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490 - 0/F · 1285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本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房维中

主 编 刘国光 王洛林 毛福民 杨冬权

副主编 董志凯 (常务) 武 力 徐建青

段东升 李明华 李和平 杨继波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洛林 王晓峰 石建国 史纪辛

刘国光 刘美玲 刘贵贞 许 虹

许卿卿 曲 韵 陈廷煊 李小宁

李应和 李和平 李明华 武 力

杨冬权 杨继波 段东升 赵月琴

赵学军 贺德海 郝和国 姜长青

徐建青 程连升 董志凯

总 序

刘国光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砺和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 21 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 21 世纪初叶，面临全球化、现代化潮流中的竞争和挑战，我们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综合国力和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实施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抚今追昔，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大型经济学术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正是来自这一宗旨。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所涉及的八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从 1958 年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年在建大中型工程项目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百位数上升到千位数，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型项目。在这一阶段史无前例的探索历程中，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又在迅速走出困境的同时创造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经验，其中一些经验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丰富内容，对于国史、党史、经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 1958 年开始到 1960 年底基本结束的三年“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试图摆脱苏联高度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探索。但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成本的大干快上，“大跃进”期间，一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改善了工业布局，农村工业第一次有了迅猛发展；同时带来严重的比例失调和经济波动，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农业的严重减产和饥荒。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我们对于以农业为基础、从全局出发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为了摆脱困境，1960 年底，党和国家对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 1961 年开始，我国经济体

制和经济运行进入了长达五年的调整时期。其中,1961—1962年为初步调整阶段,主要是纠正“大跃进”时期的体制偏差,强调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在农村,将原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同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调整农、轻、重关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精简“大跃进”期间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城市人口,关、停、并、转效益差的企业等。从1961年下半年起,为活跃商品流通采取了多种措施,在三类物资(包括工业品、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管理方面有所放松,集市贸易有所恢复,对推动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在工商企业,通过颁行《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办法,重新建立起规章制度和秩序。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取得了明显效果。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回升。

经过三年调整,渡过了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到了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这时受国际战争环境紧张的影响,我国形成了国防第一、全国支援三线建设的新局面。

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形成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农业经济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国有企业可以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代替行政手段,例如试办托拉斯、推行经济核算、强调利润指标和恢复奖金制度;希望发挥市场调节的拾遗补缺作用,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这种思路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另一种思路从维护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出发,联系中苏两党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批评上述探索为修正主义。由于两种思路是在反复探索 and 实践中形成的,其中穿插着大量的调查研究、典型试验,以及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干部思想革命化”、农村“四清”、城市“五反”等各种政治运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后一种思路在当时占了上风,为此后的“文革”作了铺垫。

抚今追昔,这些探索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供研究。通过阅读这批档案资料选编的内容,可以体会到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对于这些探索与尝试中的经验教训多一些了解,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而且对于现实与未来必将有所启迪。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和《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续编。与以往两批资料相比,第三套档案资料涉及的时限更长,内容更加丰富,数量也更多。全套丛书共计10卷,约1500万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通力协作,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作,查阅了卷以千计、字以亿计的档案资料,含辛茹苦,历时六载才编辑而成的。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

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详尽的学术资料。以往两套资料的出版，已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推动产生了一批有创新见解的国史、党史和经济史的科研成果。本套资料的面世，必将有助于更多富于创见的新成果问世。

在性质与体例上，这套丛书与前两套一样，仍是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的大型学术资料系列丛书，兼有资料性和学术性双重意义。一方面，书中正文内容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严格维护文献原意，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兼容并蓄，在有限的篇幅中，为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索提供详尽准确的来源和出处。另一方面，编者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产业结构变迁、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等方面分门别类设卷，编排成书；纲目设置原则为历史顺序和经济理论逻辑与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每一卷资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而不同于一般的文件汇编。它兼有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可以说，这套丛书也是一种形式的经济史书，这项工作更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

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家档案局、国家各部委档案部门的热忱支持，并承蒙当年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同志的谆谆指教，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由于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加之档案资料的分散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备，编辑工作必然有诸多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待再版和续编时改进。

2009年12月

凡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二、本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继第一批（1949—1952年）、第二批（1953—1957年）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之后，第三批为1958—1965年的档案资料。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地收集选录1958—1965年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反映该时期我国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三、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交通邮电、外贸共10卷。部分卷的内容间或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四、每一批丛书有“总序”，反映该批档案资料编辑的宗旨、目的、意义及其共同点。各卷写有“前言”，概述该卷的基本内容；书后附部分资料索引。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纲、目、子目三个层次，按“第X部分”、“一、二、三”、“（一）、（二）、（三）”排列，部分纲目设立分子目，按“1、2、3”排列。

六、由于按专题立卷设纲目，并确保材料精练，增加信息容量，对档案资料分别采用全录、节录、摘录方式处理。凡采用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者，题目在文前，出处在文后，发文方文后不再重列；凡采用小部分内容节录、摘录者，题目、出处在文后。为便于读者了解档案资料原貌，尽可能整段选编，并对删节之处注明〔上略〕、〔中略〕、〔下略〕。对部分人名、事件资料及已变更的地名，在页下加以简要注释，按页编序号。在每个子目之中，资料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照顾事件、逻辑相关联者放在一起，以便查阅。

七、凡属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文字，均加〔〕号；凡为遗误字，在该字后面加〔？〕号；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用□号表示。

八、各种资料标题下的日期以及资料出处的日期一律使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中的年代日期和数字，一仍其旧。

九、资料出处置于该件资料之后。为节省文字起见，部分国家机构采用简称（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分别简称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中央批转文件的收文方部分省略。部分档案资料出处以数码代之。数字为建立档案资料的部门、单位或资料书的分类编号，括号内为资料书的年号、卷次等。书后附录中有代码索引。

十、各卷附相关“要事年表”。

前言

曲 韵

本卷编辑的是1958—196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有关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的档案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与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调整时期的经济建设打下了新的基础。与我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由恢复时期的二十几个增加到“一五”期末的82个，我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不断扩大^①。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要求。其后，经济建设与国内外形势方面出现的波折与变化，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管理体制在困难与挑战面前不断进行相应调整，为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并对此后我国外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总体运行状况看，第二个五年计划及调整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贸易额发生了剧烈波动，外贸进出口结构和主要贸易对象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在管理体制方面，高度集中的外贸管理体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调整时期逐步得到强化与调整，由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向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体制转变，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管理为主要手段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执行者通过行使具有法律性质的职能，来实现国家对外贸活动的统制和管理。

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是随着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在对外贸易领域，随着1956年以后对私营进出口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形成了国营外贸企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8～1129页；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页。

业独家经营的局面。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使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迅速蔓延到对外贸易领域。1958年2月，对外贸易部提出“大进大出”口号，在盲目扩大进口的同时，超越国力扩大出口，并将对外贸易业务的管理权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下放，由此导致了争客户、争市场、削价竞销、抬价竞购等混乱现象的发生，使对外贸易的管理制度和经营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上述问题很快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并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纠正措施，一方面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和平等互利原则，另一方面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对外。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外贸工作问题，并作出《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提出九项具体规定，主要包括政府间的贸易“全由对外贸易部秉承中央意旨统一去办理”、“对资本主义国家非政府间的贸易，凡属垄断性强或大宗的进出口商品，均由对外贸易部所属总公司统一对外成交”、“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同类商品对外成交价格必须统一，对外贸易部各总公司必须按月或按季统一规定进出口价格的掌握的幅度，下达各对外贸易机构执行”、“除对外贸易部所属总公司和各口岸对外贸易机构外，任何地方、任何机构不许做进出口买卖”等^①。会议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规定“国家对于贸易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和重点使用”，并提出“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先出口、后用汇，先计划内、后计划外”的外汇使用原则。这两个决定使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已形成的国家统制的外贸体制在集中统一方面进一步加强。

在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对外贸易全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管理，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完全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开展进出口业务，对外贸易计划管理成为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核心。外贸收购、调拨、出口、进口、外汇收支等全部被纳入计划管理范畴。各项计划批准下达后，须严格组织执行，形成了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与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计划体制相配套，在外贸经营管理体制方面，外贸部直属的进出口公司按不同商品范围分工垄断全部进出口业务。各省的外贸部门只是总公司的分支派出机构。

1959年2月21日和同年10月14日，对外贸易部先后发出《关于简化对本部各进出口专业公司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手续的指示》和《关于执行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签发办法的综合指示》，各专业外贸公司以外贸部下达的货单或通知为进出口许可证，即实行“以单代证”，使外贸经营机构的管理职能和业务经营职能合二为一，进出口许可证因逐渐失去管理进出口贸易的作用而淡出，只是在其他部门进口少量急需物资时才被使用。在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经营的情况下，国家外贸计划成为既是集中调节外贸经营的单一杠杆，又是代行进出口许可等职能的集中进行外贸管理的主要手段^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后半期，进出口面临的巨大困难和挑战，使对外贸易领域这种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并延续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①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1958年8月，Z9-844-9。

②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外贸计划管理体制适应国民经济计划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了一些改革,一是扩大了地方的外贸计划权。自1959年开始,对外贸易计划改由各省、市、自治区为主编报,计划程序采取自下而上地逐级编制办法。二是在“二五”的头两年,外贸计划实行了“两本账”制度。一本是必成计划,为保证实现的目标;另一本是期成计划,为争取实现的目标。三是实行了商品分级管理。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外贸计划管理体制上,继续强调集中统一,加强综合平衡;在安排外贸计划中,坚持“以出定进,以进养出,进出平衡”的原则;在出口计划方面,强调正确处理内外销关系,努力组织出口货源,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在进口计划方面,集中使用外汇,优先保证粮食、支援农业和市场等急需物资的进口;外贸计划取消“两本账”制度,并恢复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计划编制程序。

在“大跃进”的政策错误和苏联撕毁合同造成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下放的管理权被陆续收回,对外贸易往来在中央直接指挥下进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对保证实施一些非常措施以增加出口创汇,进口急需物资,控制进出口水平和构成,避免在国际收支中出现大的逆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

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运行状况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调整时期经历了一次大的起伏,对外贸易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进出口政策也随着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形势的变化作了应对调整。在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政策方面,为配合工业化战略,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继续延续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时期以来对外贸易在经济建设中的基本定位,即服从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有计划地组织和扩大内外物资交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下,进口方面,要求“首先满足某些关键性的大型工业建设和发展原子科学、技术改革的需要,其次是满足一般工业、地方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再次是酌量满足市场需要”。在出口和收购方面,强调“大力组织新品种、工业品和机械设备的推销,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根据市场需要和国外销售的可能,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节约国内消费,拿出足够物资,以供应出口”^①。1961年以后,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造成国内市场供应极度匮乏,“一吃饭、二市场、三基建”成为组织外贸进出口的指导原则,消费资料的进口猛增,同时出口方面加强了以进养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等的建设。这一时期,在外贸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先出口、后用汇、以出定进”原则被反复强调,使用外汇、制订进口计划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统筹兼顾、适

^① 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党组会议讨论今后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人物、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的报告。1958年5月11日, Z9-855-4。

当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①。

从年度计划的具体执行情况看，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的影响，除1958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计划指标外，其他几年则没有完成计划，或勉强完成了调减后的计划。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随着国民经济总体情况得到改善，计划的完成情况有所好转，各年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年度计划。

1958年2月，对外贸易部提出“大进大出”口号后，进出口计划指标也不断“跃进”，并采取了“两本账”的形式。根据1957年10月1日《国务院关于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195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初步安排为93.9亿元^②，1958年2月，这一计划指标上升到110亿元^③，并提出第二个五年的进出口计划是：第一本账（即必成指标）进口410亿元，出口470亿元；第二本账（即期成指标）进口440亿元，出口500亿元。同年3月，指标再次攀升，第一本账中的进出口总额计划为120亿元，第二本账达到137亿元。从计划的执行情况看，经过多方努力，1958年全年实际完成进出口总额128.7亿元，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完成情况最好的一年。

1958年10月，在对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编报的进出口货单汇总审查的基础上，对外贸易部提出了1959年进口77.11亿元、出口90亿元的暂定计划指标。之后，为了使进出口计划建立在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上，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下，1959年的进出口计划指标经多次调减，然而在整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大环境下，外贸领域1959年的进出口计划虽有所压缩，仍脱离工农业生产实际，导致外汇收支逆差。1959年3月18日在《中央批转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执行对外贸易计划中存在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确定了对外贸易的“五先”原则，即对于出口商品，应该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资供应在先、收购在先、安排运输力量在先。1959年5月11日，周总理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著名的“外贸工作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方针，不仅对指导当时的外贸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其后的外贸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力争完成1959年对外贸易收购任务和出口任务的紧急指示》，指出：“要完成出口任务，必须采取‘一挤、二顶、三超’的办法”，并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经过各部门、各地区千方百计的努力，1959年底终于完成了调整后的收购和出口计划金额，并略有超额（出口完成了80.5亿元）；但从具体品种上看，有些商品没有完成计划。

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之后，强调反右倾，要求新的跃进，外贸领域再次出现追求高指标的现象。1960年2月底3月初的全国财贸书记会议要求财贸工作“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一切为了高速度”。会议确定资源分配的原则是：除了粮、油、棉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一般方针应当是国内

①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9年5月12日，Z10-941-19。

② 以下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以人民币为计值单位。

③ 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8年2月3日，A31-5。

市场的销售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该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应国内市场的销售。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陷入困境,出口货源极为短缺。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局面,当年6月外贸部门开始着手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以便扩大出口货源,并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扶植某些特种品种的生产,恢复某些传统商品的出口。

在当年7月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根据工农业生产形势,对外贸指标进行了调整压缩:收购由105亿元调减为85.28亿元,出口由84.3亿元调减为65.26亿元。8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并成立由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组成的对外贸易三人领导小组,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全国的外贸收购、调运和出口,严格控制进口。各省、市、自治区也分别成立由第一书记挂帅,有关分管书记具体负责的本地区的对外贸易指挥部。在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虽然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并采取了种种措施,当年的对外贸易计划完成情况仍很不好。

由于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境,我国经济建设已不能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继续发展。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按照“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初,根据我国农业生产连续两年歉收的情况,在外贸收购和出口方面,大大减少了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数量。在进口方面,根据吃饭第一、稳定国内市场、争取农业丰收和支援工业建设的要求,大力组织粮食进口,并增加了“以进养出”商品的进口。为了保证粮食和其他必不可少重要物资的进口,同时保持外汇收支大体平衡,1961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1961年对外贸易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确定了进口“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先进急需,后进一般,先出后进,以进养出,进出平衡”的原则。为了加强出口商品生产和出口货源组织工作,同时要求进一步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工作,保证专材专用,指定专厂、专矿、专车间生产出口商品,并责成外贸部门派出驻厂代表严格检查出口商品的规格和质量,并由中央各有关部门指定一位副部长专门负责组织对外贸易货源工作。当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外贸收购工作的指示》,确定当年外贸进口要贯彻实行“一吃饭、二市场、三基建”的方针。10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紧当前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结合秋季农产品收购运动,抓紧组织出口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经过上述努力,外贸严重出超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扭转。全年出口商品总额48亿元,超额2.9%,完成了修订后的出口计划;进口总额42.1亿元,完成计划44.1亿元的95.5%^①。

① 国家统计局编:《调查统计报告》,1962年第9号。

1962年,依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精神,在1961年进出口实现额比上年大幅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调了进出口计划指标。配合各种限制进口、扩大出口的措施,当年进出口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出口大于进口。全年出口商品总值45.7亿元,完成计划的107.5%,比上年减少2.1亿元。全年进口33.3亿元,完成计划的101.2%,比上年减少9.7亿元。进口货物中,支援农业和国内市场的商品以及“以进养出”的物资进口约为22.6亿元,比上年减少12.4%,但占进口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60%上升到68%左右^①。虽然1962年是“二五”时期对外贸易计划完成较顺利的一年,但当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6.6亿美元,与“二五”头一年1958年的38.7亿美元相比下降31.3%,占当年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0.9%,相当于我国1950年的水平^②。

整个“二五”时期我国外贸进出口完成的实绩是:进出口总额578.1亿元,其中,进口274.8亿元,出口303.3亿元,不仅没有完成外贸局长会议确定的第二本账的计划指标,即使与第一本账相比也相差甚远。整个“二五”时期,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速为-3.0%,与“一五”时期年均递增9.8%的发展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③。

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的外贸政策大体延续1961年以来确定的“一吃饭、二市场、三基建”的原则。随着国民经济总体情况的逐步好转,计划的完成情况也逐步改善。1963年,在进口方面仍重点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出口方面,粮食和食油,除品种调换外,坚决不出口;国内工业生产上迫切需要且供应紧张的商品以内销为主,适当安排外销,其他商品继续坚持内销服从外销原则。进出口计划指标在经过多次调整后,于1963年11月经中央批准最终确定,即外贸收购56.5亿元,出口43.4亿元,进口33.15亿元,其中,收购和出口比2月份的原定指标都略有提高。当年收购实际完成64.05亿元,出口完成49.56亿元,进口完成34.4亿元,都超额完成了计划。

1964年,在上年计划完成情况较好的情况下,外贸收购、出口和进口计划都略有增加,特别是由于粮食、新技术设备以及以进养出物资等的进口进一步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为了支付进口所需外汇,出口物资也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作了调整,因此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贸易额及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当年收购计划完成83亿元,是1960年以来最多的一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3.4亿美元,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所占比重由上年的58%上升到70%^④。

1965年在继续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情况下,减少了粮食的进口,将三线建设所需物资和新技术及成套设备的进口放在优先地位,同时适当增加了猪肉、蛋品等国内货源农副产品的出口,并继续扩大以进养出。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间的进出口指标则进一步减少。

① 国家统计局编:《调查统计报告》,1963年第6号。

② 国家统计局编:《全国财贸统计资料1949—1978》,1979年10月,第295页。

③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5年版,第IV-4页。

④ 对外贸易部党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1965年对外贸易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1965年2月18日,150-13-287。

“二五”时期和调整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不仅在总量上经历了一次大的起伏，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有很大改变。进口方面，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中国进口的商品绝大部分是生产资料，分别占进口总额的84.7%和91.36%，生活资料只占15.3%和8.64%。“二五”时期初期继续保持这一格局并有所发展。1958年，生产资料在进口商品中的比重达到93.1%，之后的两年更达到95.7%和95.4%，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生活资料所占比例分别只有6.9%、4.3%和4.6%。从1961年开始，这一构成发生急剧变化。由于国家进口了大量粮食、食糖、食油等应急物资以缓和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并进口棉花用于加工生产棉布以增加出口和供应国内市场，当年生产资料的进口只占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61.9%，次年降至55.4%，之后两年大体维持这一水平。直至调整期末的1965年，生产资料所占比重才又有所上升，恢复到占66.5%。与此相应，消费资料的进口1961年以后大幅增长，1961年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4.6%猛增到38.1%，次年达到44.8%，此后至1965年，这一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①。进口商品结构的这一变化一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后机械设备及其他物资的进口骤降；二是1961年开始推行的“一吃饭、二市场、三基建”原则的直接结果。

出口方面，“二五”初期为了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进口需要，外贸领域大幅提高了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出口数量。1958年外贸收购农副产品总额为30.10亿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550亿元的5.5%。1959年，在农业总产值下降到475亿元的情况下，外贸收购农副产品总额增加到37.89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8.0%^②，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外贸收购农副产品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最高值，大大超过当时我国农业生产的承受能力。由于从1959年起粮食连年减产，粮、棉、油、肉等主要农副产品出口额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60年起开始持续下降，工业品出口比重增加，并逐步占据主要地位。1958年和1959年农副产品在出口中分别占35.5%和37.6%，1960年降为31%，1961年和1962年进一步下降到20.7%和19.4%。与此同时，轻工业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958年的41.7%增加到1962年的53.3%，同期重工业产品出口比重由22.8%增加到27.3%。调整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农副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又略有回升，由1963年的24.2%上升到1965年的33.1%。轻工业产品在绝对量增加的同时，占比略有下降，由1963年的占51.4%降为43.5%，重工业品所占比重在调整时期基本保持在24%左右。“二五”时期与调整时期，工业品出口比重相对“一五”有所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在政策导向下工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一些轻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具有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当时外贸领域大力推行“以进养出”政策，进口原料制成成品出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和调整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往来对象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改

^① 本段数据引用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5年版，第IV-10页。

^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全国财贸统计资料1949—1978》，1979年10月，第315页。